

他国形象的语篇建构

——《纽约时报》故宫失窃案报道中的中国形象解读

夏芳

摘要 本文以《纽约时报》关于2011年故宫失窃案的一篇报道为研究文本解读该报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显示,报道存在对中国的误读,文本作者通过不严谨的叙述,以及由于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欠缺而妄加推测建构出一个不实的中国形象,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 他国形象;中国形象;语篇;建构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夏芳,中国计量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18

他国形象是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在外界民众心目中的主观认识,是自我文化在他国形象上的投影,是对他国文化的社会想象。想象来源于文本,“(文本)是一面凹凸不平、模糊甚至变形的镜子。”^[1]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就在不同时期的文本镜子中起伏变换。“在没有书报的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流传于神话之中;在没有报纸的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存在于典籍之中;在有了报纸和其他现代传媒的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完全被大众传播工具所左右。”^[2]作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尽管本质上与真实性、客观性无关,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不露声色地影响着国际交流,而且随着文化全球化程度增强,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研究西方媒介中的中国形象,有助于了解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向他们传递良好、真实的中国形象,增进国际间交往,营造和平、和谐的国际环境。

一、文本与他国形象

“他国”形象研究起始于比较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相对于“自我”而存在的“他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将“他者形象”定义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3]徐小鸽认为信息全球化环境中的国家形象是“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4]该国的现实通过新闻报道者使用语言等符号方式经过“自我”的文化过滤反射出来,与符号使用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5],人们往往意识不到现实

与形象差异而成为社会集体无意识。一旦形象形成,由于现实的缺席,形象就会超越现实,赢得比现实的他者优越的地位,提供某种先在的期待,进而影响他们对现实中他者的理解和判断。^[6]

西方大量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勾勒出了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那么中国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形象?真实吗?现代欧洲文学研究者Joep Leerssen教授对形象学研究方法的观点^[7]。他谈到民族特性(national characters)时说:我们关心的不是“成见(reputation)”是否是真的,而是“成见”是如何被人识别的,是追问“成见”产生的语境(context)或文本(text)。

我国的形象学研究成果多见于本世纪,如孟华(2001),国家形象研究则是近五年的研究热点^[7],如周宁(2004)。应对瞬息变化的国际环境,我国国家形象的国际意识和传播能力很弱,虽然传播学形象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探讨了西方媒体中的国家形象,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妖魔论’的论点,但是目前的研究多数止于单纯的描述,未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成因进行深层次的分析。”^[8]孟华教授提出当代形象学要重视“注重文本内部的研究”,要重视文本与外部语境相互交接的情况,要有总体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意识,不仅要研究文本的语言特征,还要研究社会、历史、文化做综合性的考察。^[9]

本文以《纽约时报(网络版)》一篇中国新闻报道为例,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综合运用功能语言学、阐释学、批判话语分析等理论和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揭示形象构成的话语机制:西方新闻文本构建了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该形象说明了什么?在国际传播中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传播良好的中国形象,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二、中国形象的语篇建构

2011年5月8日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临时展出的9件现代工艺展品失窃,随后找回两件,最终追回6件。因为事发地点特殊,盗窃案件一发生,立刻受到各界高度关注。《纽约时报》有两篇报道,为同一作者,即

记者基斯·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2011年5月11日网络版上发表题为“Purse Snatcher Embarrasses Chinese Museum”的报道,并印制在第二天(2011年5月12日)的纸质版上。而后,2011年5月12日网络版上有题为“ Theft Reveals Lapses in Chinese Museum's Security”的报道。本文就第一篇报道文本进行分析,理由是第一时间的报道最能真实地反映出对中国的无意识想象对作者的影响,文本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是最原本的西方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无意识想象物。

(一)局外人的事件描述:词和句

作为《纽约时报》记者的身份注定基斯·布拉德舍以局外人(outsider)的观察视角来撰写报道,显然“Chinese Museum”处于“他者”的位置上。题目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赋予中国博物馆以人的情感,将窃贼与之形成对立的双方,读者感觉到是一个盗贼使中国博物馆所代表的官方对该事件显出的尴尬。报道人是以观看者的姿态注视着事件中的双方。我们常常认为置身其中的局内人(insider)主观性太强,不利于客观的事件描述,实际上局外人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对于“他者”的理解必定要经过观察者自己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的过滤。我们不能仅凭文本断定作者的目的和意图,但是标题中“purse”的内涵(connotation)和外延(denotation)向读者展开了一副有普遍接受性的想象图景。由于“purse”的常规功能是用来装钱的,所以“purse”被提及时,听者和读者自然联想到“钱”。一个目标为钱包的窃贼多半是为日常生活发愁的人,于是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中国人形象就这样被介绍给西方了。实际情况是,“purse”只是被盜物品之一,其余六件均为化妆盒,那么“purse”不是失窃物品的代表,它在标题中出现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为什么单单用“purse”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作者在撰写报道时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二是作者故意为之。但是无论何种原因,一旦文本形成并发表,那么文本构建的中国形象就已经独立于作者存在,进入了无数的读者脑海,成为他们对中国认知的一部分。

该报道不含标题共316词,11个句子。第1-5句描述事件经过,叙述风格简练、浓缩,引用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现了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但是,我们仍从下列间接引用中能读出作者对中国官方和博物馆管理方的不信任。

摘录1 :A Palace Museum worker tried to stop a “suspicious man” inside the museum at 10:30 p.m. on Sunday, but the man ran off, prompting the worker to sound an alarm, Palace Museum officials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Beijing. Two of the purses were found in “slightly damaged” condition, they said, but the other seven are still missing.

上述两句转述来自故宫博物院官员在北京新闻发布会的情况说明。首先抓住眼球的是两处引号,一是“可疑人(suspicious man)” ;二是“轻微损坏(slightly damage)”。第一个句子中包含了连串的动作,“故宫工作人员试图阻止可疑人,但那人跑掉了,情急之中工作人员敲响报警器。”“试图(tried to)”“跑掉(ran off)”“情急(prompting)”三个词构成的形象是:一群既没有高度警惕性也缺乏训练的工作人员只是“尝试”阻止“可疑人”,致使那人轻松跑掉,才在情急下报警。显然,工作人员的素质与故宫博物馆以及此次展览的规格要求相去甚远,我们也不难读出作者否定的评价,同时直接引用“轻微损坏(slightly damaged)”也显示出作者对中国官方陈词的不信任。巴柔认为形塑者与他者所持的态度有三种,构成相应的关系状态。憎恶关系中“形塑者由于憎恶他者而贬低之,将其视为落后、低劣抑或邪恶的存在”^[10],对于一个持否定态度的记者,他的报道多少都会不自觉地丑化中国形象。

(二)报道人的事件逻辑:衔接与连贯

衔接是“语篇中语言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或者说是语篇中一个成分与另一个可以与之相互解释的成分之间的关系。”^[11]语篇借助多种衔接手段构成语篇,本文仅从照应(reference)关系来分析该报道。语篇中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等表示比较的词通过“内指”(endophoric)和“外

指(exophoric)”形成序列结构,称作“照应链(reference chain)”。

以文中的名词和人称代词为照应链成分进行衔接分析,得到下列数据:以文中首次出现的没有前指关系的名词和指示代词为衔接链的起始点进行统计,如第一段的“a thief”“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s Forbidden City”“gold purses”“Chinese officials”分别作为四个照应链的起始点。如此计算,全文有23个起始点。

照应链越长连贯性越强,信息的相关性越高。文中第1至5句,有11个起始点,其中有8个照应链,而且一半以上照应次数在三次或以上,说明作者拥有的相关信息量大,思维流畅。但是接下去的第6至11句中照应次数在三次及以上的只有3个,而且似乎只有一处照应链与前文的5句有所关联,此外没有与前文的照应关系,说明后部分叙述与前文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联系。从连贯性来讲,这两个部分不连贯,也就是说作者是牵强附会地硬是将二者联系起来。从内容来看,第二部分以“The theft is likely to have a political dimension as well.(窃贼可能也有某种政治目的。)”开头,与前文没有照应关系,逻辑上十分突兀,说明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完全没有根据,如果说有所来源,只能说明作者的中国历史知识十分有限,用不全面的历史知识来解释眼前的事件,自然缺少逻辑关系。

三、结语

通过对《纽约时报》故宫失窃案报道中的中国形象解读,透过这面镜子,我们看到了当今西方社会中的中国形象仍然是落后、政府无力的国家形象,西方社会仍然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并以自我为中心的姿态俯视着、评判着中国,以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在中国形象上,塑造着他们心目中的弱者——中国。我们应该深入研究西方的传播规律,研究西方社会对中国知识的欠缺情况,有的放矢地加强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进步。

(接第68页)

目内容严格审查外,还需加强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教育,从被动防御走向主动规避,如通过学校教育,开设专门针对儿童生理和心理健康的课程或者讲座;通过加强亲子教育强化家庭教育。此外还需要为儿童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成立多种专门针对儿童的咨询和服务中心,定期开展各种知识讲座和益智的游艺活动;成立社区、街道、村镇的儿童俱乐部或者游乐园,将健康教育知识寓教于乐等等。

4.培养媒介素养,提高儿童对抗能力。媒介素养“是学生理解和运用大众媒介方法,对大众媒介本质、媒介常用的技巧和手段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9]目前,很多国家都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学校课程并逐步形成规模。我国最早触及媒介素养是在上世纪90年代,但目前仍然没开设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儿童媒介素养教育还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需要,难以正确地使用和对待电视。

5.开展多种社交活动,帮助儿童摆脱对电视

的依赖。调查发现,一些儿童长期呆在电视机前逐渐变成了“电视人”,并形成了孤独封闭的个性,需要开展针对儿童的多种社交活动,以帮助他们走出封闭,在与其他儿童接触的过程中养成开朗、积极向上的个性,最终摆脱对电视的依赖。

参考文献

-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2003.
- [2]贾金玲.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的思考.教育探索[J].2007.
- [3][5]陈昌凤.电视对未成年人之社会化的影响.电视研究[J].2004.
- [4]谢辉.7岁女孩模仿《还珠格格》小燕子上吊意外死亡.南方日报[N].2012-2-7.
- [6]杨孝文.儿童看电视时间越长越易发胖.竞报[N],2005-9-16.
- [7]新华网.英国限制向儿童做垃圾食品电视广告.2006-3-31.
- [8]台湾打算效仿英国和韩国,禁止在儿童电视节目中间播放垃圾食品广告.联合早报[N].2010-1-29.
- [9]张开.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现代传播[J].2003.

(接第23页)

参考文献

- [1]周宁.跨文化的文本形象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1999(1):120.
- [2]赵雪波.关于国家形象等概念的理解[J].现代传播,2006(5):65.
- [3]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转引自孟华.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0(4)(总41):3.
- [4]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C).转自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M].刘继南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7.

- [5][10]孟华.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J].中国比较文学,2000(4)(总41):4.
- [6][11]张月.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112.
- [7] <http://www.imagologica.eu/leerssen>
- [8]王鹏进.媒介形象: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关键环节——一种跨学科的综合视角[J].国际新闻界,2009(11):37.
- [9]冉继军.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研究综述(下)[J].新闻知识,2010(8):54.
- [12]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179.